



第三编

妇女参与政治和 公共生活



印度尼西亚爪哇妇女
在选举当日手拿选票
排队投票。

如同经济和行政改革成果一样，国家履行政策承诺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政治，这对于性别平等或其他任何问题都不例外。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明显，发展分析人士对于政治动态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关于政治进程如何影响性别平等以及人们为实现性别平等而做出的不懈努力，目前尚未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

本编将探讨广泛的政治领域与在公共政策中促进妇女权益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编还将就以下假设进行分析：妇女更多地参与公共决策机构，可以使得政府机构更加关注性别问题，增加政府开支来满足妇女的需求。

本编第一章《妇女担任公职：上升趋势》分析了民选国家议会中的女性人数空前增多这一令人鼓舞的发展趋势，并探究了相关机制及影响。本编第二章《动员妇女重塑民主》探讨了世界各地的妇女运动对于公共决策的影响，并论述了围绕妇女其他政治身份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妇女作为宗教或种族团体成员时所引发的问题。国家和地方公共机构当前奉行的“善政”改革纲领对于妇女和性别平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改革纲领对于性别问题是否具备适当的敏感意识呢？本编第三章《性别和善政》和第四章《权力下放和性别平等》分别阐述了多项公共部门改革对于妇女的影响，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旨在加强公共问责制，促进民众参与决策。

男女平等：在不平等的世界里争取公正





第九章

妇女担任公职： 上升趋势

《北京行动纲要》中的一项进步决议呼吁国家让更多的妇女担任公职。尽管各国政府对此反应不一，尽管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代表机构。这是一项值得庆贺的成就，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全球各地的民主。

国家议会中的女性平均比例从1995年的9%增加到2004年的接近16%（远远低于北京平等倡议），但有16个国家已经成功地将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女性比例提高到了30%，甚至更高（表9.1）。2003年，卢旺达议会中的女议员人数接近一半，超过了排名全球首位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创下了世界纪录。同年，芬兰的国家元首（总统）和政府首脑（总理）同时为女性。这对于政治生活中的当选女性来说，又是一个“首例”。然而，这些成就属于少数例外。在没有采取平权行动等措施来增加女性候选人人数的情况下，全球妇女参政水平仍然很低，增长速度很慢，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

正如在第一章（图1.3）所示，除东欧和中亚之外，世界各地担任公职的妇女人数增长缓慢。1989年之后，由于东欧和中亚地区的前社会主义国家放弃了共产党曾经使用过的妇女配额制，国家立法机构中的女性比例遽然缩减了50%；直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善。从中可以看出，促进妇女参政的种种努力很容易付之东流。

政界妇女人数不是衡量妇女参政程度的最佳指标，不能充分说明妇女能否有效地引导决策关注性别问题，也未必能够反映出公民社会在妇女问题上的活动程度。在1989年之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为数众多的妇女步入政坛，但这与妇女运动组织的实力没有任何关系；独立的妇女公民社会活动实际上受到当局的压制。¹印度和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在这两个国家，妇女运动的数量、组织类型和成员人数均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国家机构任职的妇女人数却是最少的。²

活跃于妇女组织中的女性人数，以及活跃的妇女组织的数量，可能要比民选机构中的女性代表人数更能说明妇女的参政情况。目前还没有关于妇女协会和妇女运动的组织数量及实力的跨国比较数据。即使掌握了这方面的数据，我们也不能局限于数据背后的含义，而是应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妇女的参政情况。很多妇女通过参与各种政治协会及公民协会来表达自己的权益和观点。

表 9.1 国家议会中的女性比例达到“临界点”（30%或以上）的国家，2004 年 4 月

国家	选举制度	是否采用配额 ⁽²⁾	2004年妇女在国家议会中的比例（%）
卢旺达	简单多数制： 多数票当选	是 类型1：《宪法》确定妇女配额。 类型2：国民议会80个议席为妇女保留24席。 类型3：为妇女保留20%的政务委员会委员。	48.8
瑞典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是 类型4：瑞典社会民主工党、左翼党和绿党均规定50%的 妇女配额。	45.3
丹麦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否 曾经采取类型4。 1996年前后放弃配额制。	38.0
芬兰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否 不详。	37.5
荷兰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是 类型4：工党规定50%的妇女配额；左翼绿党也为妇女规 定了配额（具体百分比不详）。	36.7
挪威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是 类型4：社会主义左翼党、挪威工党、中央党和基督教人 民党为妇女规定40%的配额。	36.4
古巴	绝对多数： 两轮投票制	否 不详。	36.0
西班牙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是 类型4：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为男女都规定40%的配额。	36.0
比利时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是 类型2：为男女各规定三分之一的最低配额；政党候选人 名单上的前两人不得为同一性别。 类型4：在佛兰芒社会主义党和法国社会主义党规定50% 的妇女配额。	35.3
哥斯达黎加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是 类型2：所有公共选举均规定40%的妇女配额。 类型4：在民族自由党和基督教—社会团结党规定40%的 妇女配额；公民行动党规定50%的妇女配额。	35.1
阿根廷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是 类型1：《宪法》规定妇女配额。 类型2：政党候选人名单的30%必须为有可能当选的妇女。 类型3：首都和省级法律规定妇女配额。 类型4：大多数政党采取30%的妇女配额。	34.0
奥地利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是 类型4：绿党规定50%的妇女配额。奥地利人民党和奥地 利社会民主党分别规定了33.3%和40%的妇女配额。	33.9
德国	比例代表： 混合代表制	是 类型4：民主社会主义党和绿党规定50%的妇女配额，基 督教民主联盟为33.3%，德国社会民主党为40%。	32.2

表 9.1 国家议会中的女性比例达到“临界点”（30%或以上）的国家，2004 年 4 月（续）			
国家	选举制度	是否采用配额 ⁽²⁾	2004年妇女在国家议会中的比例（%）
冰岛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是 类型4：人民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均规定40%的妇女配额。	30.2
莫桑比克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是 类型4：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规定30%的妇女配额。	30.0
南非 ⁽¹⁾	比例代表制： 名单投票	是 类型4：非洲人国民大会规定30%的妇女配额，地方政党候选人名单规定50%的妇女配额。	30.0

注： 世界其他国家的女性议员比例低于30%。

(1) 截止2003年12月（没有截止2004年4月的资料）。

(2) 涉及以下类型的配额：

类型1 = 《宪法》规定议会中的配额

类型2 = 《选举法》规定议会中的配额或做出相关规定

类型3 = 《宪法》或立法规定地方政府中的配额

类型4 = 政党候选人配额

资料来源：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2002；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和斯德哥尔摩大学，2004；各国议会联盟，2004。

迈向“临界点”

代议制政治机构中妇女人数的增多，有可能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但妇女的存在、人数以及知名度都是重要的事实。妇女更广泛地参与正式竞选，凸现出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可以改革选举制度，促进性别代表平等；可以挑战男性把持政党的局面；有更多的妇女高调进入高级决策层，可以推动政策和政务更多地满足妇女的需求。

有观点认为，一旦妇女人数达到“临界点”，将能够改变政治文化、做法和结果。关于“临界点”的比喻最初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用以解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妇女在地方及国家政府机构中的普遍任职对于制订决策和确定优先项目所产生的影响。一般认为，达到临界点的比率在30%左右。³例如，挪威达到“临界点”之后采取了多项措施，

增加政府补贴的保育服务、延长育儿休假、采用弹性工作时间、为无偿护理工作者提供更多的养老金。⁴1994年，南非政府中的女性官员比例达到25%，在她们的推动下，政府出台了关于强奸、家庭暴力和堕胎权的新法律。⁵

“临界点”是非常有效的动员口号，意味着妇女参政人数的增加和有利于妇女的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某种自动发生、不可逆转的因果关系。且不谈实现性别公正，要让更多的妇女步入政界，这本身就极具挑战性，更何况在进入政坛与能够对决策施加影响之间还横亘着多重障碍。这其中包括政党和政府机构当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偏见，从确定优先事项的财政政策和预算系统，到执法、司法和公共问责机制，无不笼罩在这些偏见之下。要冲破这些障碍，仅仅增加妇女参政人数是不够的。

妇女为什么会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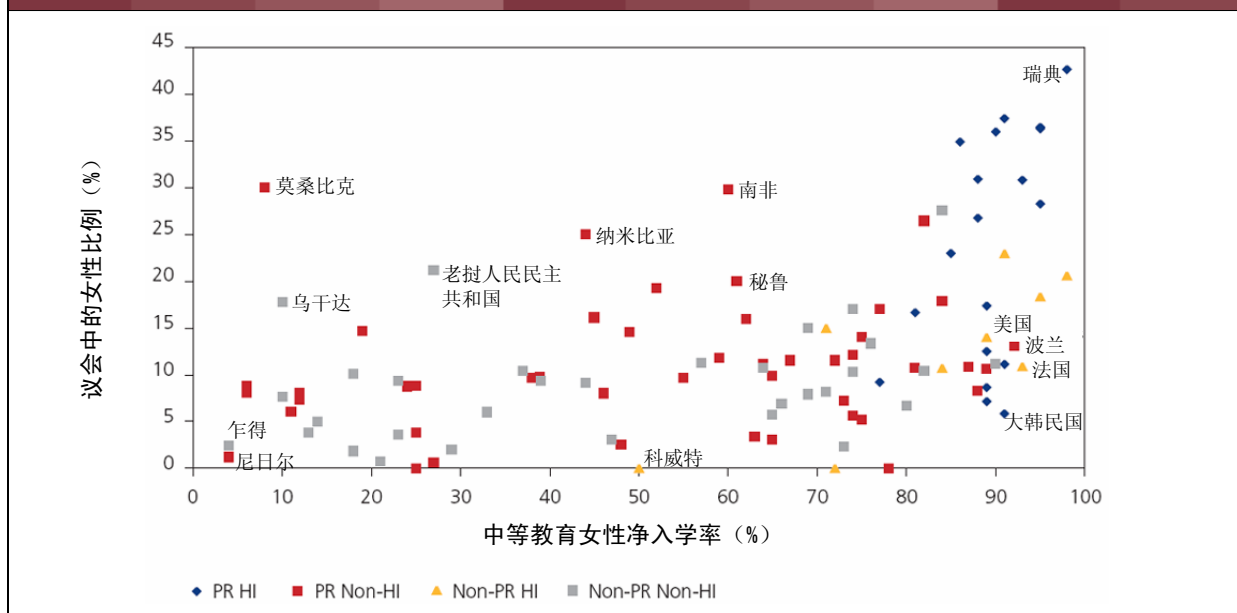
针对妇女参政人数较少的现象，通常的解释是——妇女的教育程度、空余时间、就业、收入和社会关系等参与公共生活的资源禀赋不如男性。但正如图9.1至9.3所示，在妇女的教育程度或经济活动同妇女的参政水平之间很难找到明确的相互关系。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女性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净入学率很相似，但妇女在政治机构中的代表比例却大相径庭。妇女的经济活动参与率和担任公职的妇女人数之间的关系也不均衡。没有证据表明，妇女参政就一定能够增进妇女在教育或就业方面的相对地位。

对于23个亚洲中、低收入国家进行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此次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实行

全民教育的国家（例如韩国），女性普遍接受教育的国家（例如斯里兰卡），还是女性识字率极低的国家（例如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各国妇女的参政水平之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差异。⁶ 这说明还有其他与性别有关的因素阻碍妇女参政，其中很可能包括政治机构中的选拔和待遇歧视。

正如图9.4所示，国民收入会影响妇女的参政情况。高收入国家的妇女往往会受益于较高的人力资本，而且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和责任机制比发展中国家或转型期国家更为健全，各种制度也更加开放。但这类平均数据往往掩盖着很大的差异。例如，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美国的女性参政比例一直偏低；而在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例如卢旺达和莫桑比克），妇女的参政水平却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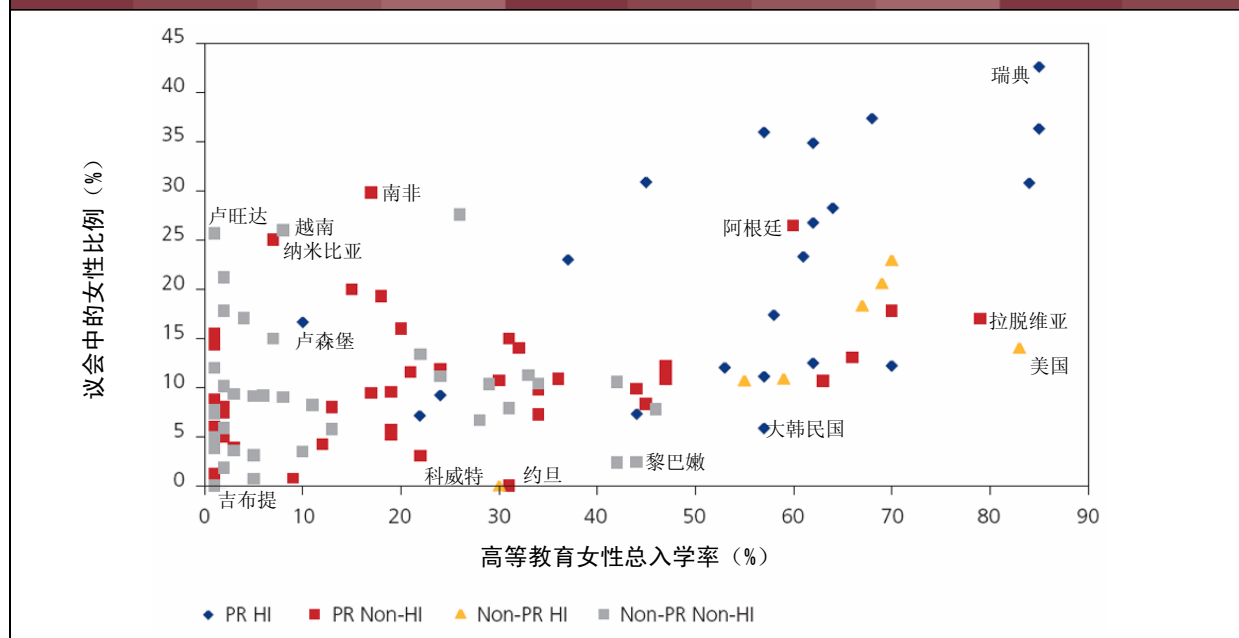
图 9.1 2001 年议会中的女性比例和中等教育女性净入学率



注：PR=采取比例或半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国家；Non-PR=不采取比例或半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国家；HI=高收入国家；Non-HI=非高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200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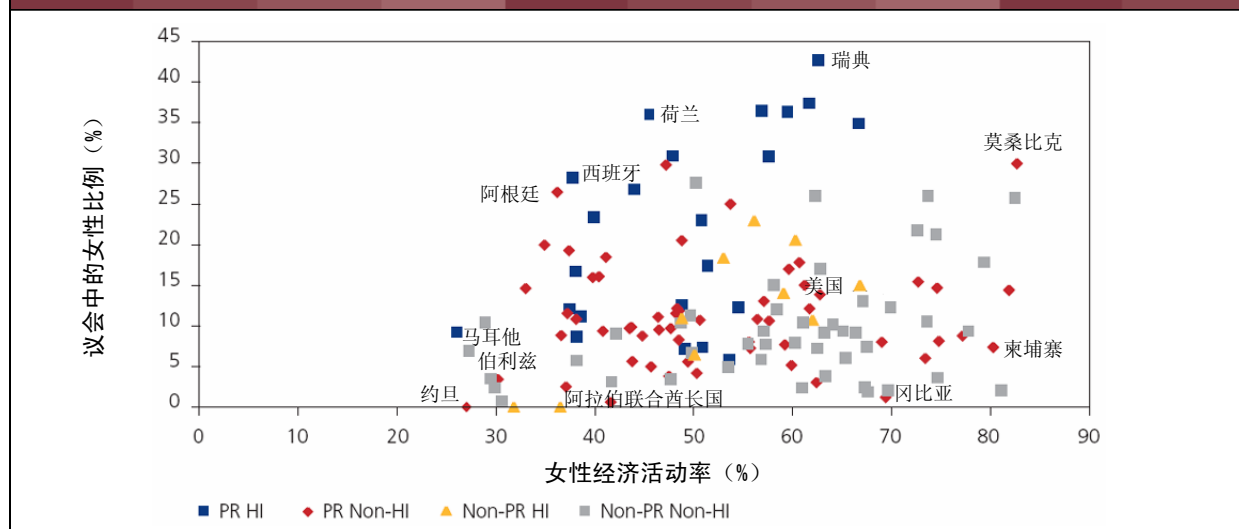
图 9.2 2001 年议会中的女性比例和高等教育女性总入学率



注：PR=采取比例或半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国家；Non-PR=不采取比例或半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国家；HI=高收入国家；Non-HI=非高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200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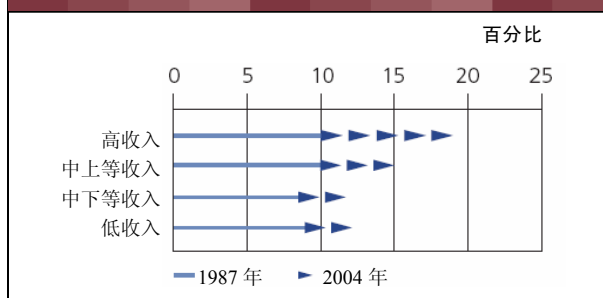
图 9.3 2001 年议会中的女性比例和女性经济活动率



注：PR=采取比例或半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国家；Non-PR=不采取比例或半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的国家；HI=高收入国家；Non-HI=非高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200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3。

图 9.4 议会中的女性比例：按收入水平分列的平均变化（1987 至 2004 年）



资料来源：各国议会联盟，2004；联合国统计司，2004；联合国，2003。

印度喀拉拉邦和拉贾斯坦邦的数据显示，文化差异对于妇女参政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喀拉拉邦具有母系社会传统，同印度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妇女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流动性，结婚时间也要晚很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拉贾斯坦邦有着强烈的父权思想，继续奉行童婚等传统做法。这两个邦的女性识字率相差极为悬殊：喀拉拉邦为86%，拉贾斯坦邦仅为20%，在农村更是低至12%。然而，喀拉拉邦妇女在文化和教育

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帮助她们在参政人数上超过拉贾斯坦邦。两个邦立法议会中的女性比例都不足10%，喀拉拉邦的这一比例在1993至1997年间最高达到9%，拉贾斯坦邦的这一比例在1985至1990年间最高达到8%。⁷

选举制度和妇女参政

喀拉拉邦和拉贾斯坦邦的文化各有不同，但两个邦的选举制度却是一样的。有证据表明，选举制度（将公民投票转化为代议制机构席位的方式）是预测参政妇女人数的最佳方法。⁸ 采用地区和全球数据的回归分析往往产生同样的结果。2003年，在提供统计数据的174个国家中，采取比例代表选举制（PR）的国家的女议员比例平均为16%，没有采取比例代表选举制的国家（采取简单多数/多数制或半比例代表制，见方框9.1）的女议员比例为11%。某些地区的差距极为明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采用比例代表选举制的国家的立法机构女性成员平均比例为12%，采取其他制度的国家仅为5%。

方框 9.1 选举制度差异的性别影响

选举制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将选票转化为代议制机构席位的选举方式、选票结构和选区规模这三个方面。

选举制度主要分为两大类：简单多数/多数制和比例代表制。

简单多数/多数制通常适用于单一议席选区，选民选择自己喜欢的候选人，票数多者获胜。有些选举制度照顾到多数偏好，在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之间进行最终对决。但最常见选举方法是威斯敏斯特式单一议席简单多数制，目前至少有 70 个国家采用这种选举制度。

根据比例代表制，选民选择自己支持的政党，相关机构的席位将根据各个政党获得票数的百分比按比例分配。比例代表制的选区通常采取多议席制，有多名代表入选。比例代表制的选票结构为选民提供“开放”或“封闭”的候选人清单，选民可以从中选择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如采用“封闭”式清单，政党将根据得票比例确定获胜的候选人。假如政党得到 40% 的选票，候选人名单上排名在前 40% 的候选人获胜。

半比例代表制结合了比例代表制的候选人名单和简单多数/多数选举制，某个选区的选民可以同时选择政党（根据得票比例分配候选人）和候选人。这种方式采用简单多数原则和多议席选区制。

比例代表制的经验表明制度差异如何在有意无意之间产生性别影响。比例代表制旨在代表多种利益，事实证明，这种制度比简单多数/多数选举制更有利于妇女参政。在后一种制度下的当选机会只有一次，这种胜者全得、败者全无的竞选必然要求政党推举最稳妥的候选人，而这往往是一位“普通男性”的代表。根据多议席比例代表制，有实力的政党有望看到多名候选人当选，才可能推举更多的女性候选人。

即使是在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国家，入选议会的妇女比例也存在很大差异。以色列和希腊等国立法机构当中的女性比例一直偏少。与此相反的是，在新西兰和加拿大等采用单一议席简单多数制的国家，妇女的当选比例却很高。由此可见，选举制度的不同还不足以解释各国之间的差异。这同时也说明，有多种因素影响妇女的选举前景，其中包括政治文化和政党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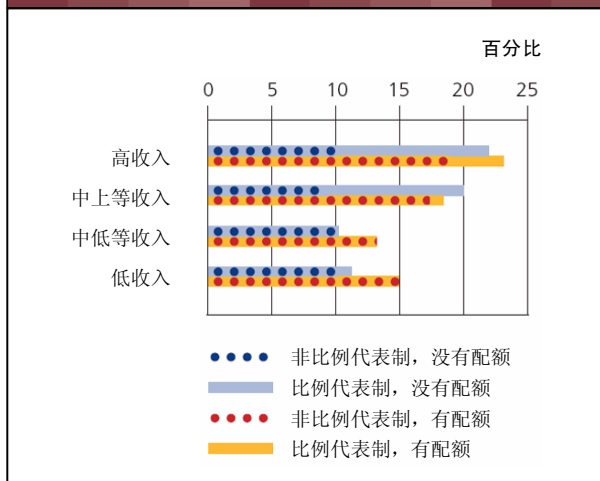
平等权利行动：提高人数

妇女配额

近十年来，有关方面在采用平等权利行动和全体妇女配额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以期在代议制政治中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政党候选人名单中的妇女配额是促进妇女参政的最常见手段，如今已有80多个国家采取这种方法。正如图9.5所示，配额制提高了妇女在比例代表制度下的当选机会，在非比例代表制下同样可以帮助更多妇女竞选公职。

政党采取配额制，可能是迫于女性党员的压力，也可能是基于法律的要求。在采取单一议席、简单多数选举制度的情况下，政党在各地方的分支机构负责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很难实行配额制。要求推选女性候选人的压力可能会遭到抵制。在

图 9.5 按收入水平、选举制度以及是否采用配额制分列的 2004 年各国女性议员平均比例



资料来源：各国议会联盟，2004；联合国统计司，2004；联合国，2003；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2002；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和斯德哥尔摩大学，2004。

这种制度下，有些政党曾经鼓励那些负责确定候选人的党员尽量推选妇女，但只是制订了党内“目标”，没有采用严格的配额制度。

仅有配额还不能保证提高妇女的代表比例，还需要政党给予支持。假如政党将女性候选人的名字排在封闭名单的末尾，除非该党以压倒多数大获全胜，否则这些女性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议会，政党可以这种方式规避关于配额的规定。如果不对违规者采取惩罚措施，地方政党通常不会主动采用配额制（见方框9.2）。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国家的配额制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大幅度增加当选女性人数。例如，巴西、委内瑞拉和巴拿马都正式规定国家议会的女性配额为30%，但实际当选的妇女比例却分别为9%、10%和10%。

假如选区的规模较大，而且要求男女候选人

在名单上均匀排列，配额制的作用最明显。男女均匀排列的名单即“拉链”式名单，在南非又称“斑马”名单，男女候选人的名字交叉排列。对拒不遵守配额规定者给予惩戒，例如取消政府活动补贴，可以确保政党的配合。阿根廷、玻利维亚、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等国政府采取了上述这些做法。阿根廷规定30%的妇女配额，妇女在最近一次全国选举中赢得了31%的议会席位；哥斯达黎加规定40%的妇女配额，女性议员比例为35%。两国的选举法都规定，应该将妇女排在可以获胜的位置上。

保留席位和选区

在采用单一议席、简单多数制的情况下，采取为妇女保留席位的措施要优于妇女候选人配额制度。议席可以通过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来确定，保留席位的制度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坦桑尼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国数十年来的做法是根据各政党赢得的议席数量，将议席比例分配给由政党自己提名的女性候选人。这种保留席位的做法充其量不过是进一步巩固了政府中多数党的地位，损害了女性议员的合法性。

乌干达通过间接选举程序确定议席，并为全国每个选区的“女代表”保留特别席位。大多数

女性议员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议会的，由地方政府代表组成的选举团负责女议员的推选工作。选举团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

另一种平等权利方法是为女性候选人保留一定比例的选区。这样一来，妇女能够全身心投入竞选，而不必游说党内精英，要求获得提名。1992年印度宪法修正案要求地方政府为妇女保留三分之一的席位，女性选区在每轮选举中进行轮换，让新的选区有机会（或者迫使其）选举一位女性代表。

平等权利措施的影响

配额和预留制度的规划及实施对于保有相关席位的政界女性的合法性产生了影响。此外，女政治家同妇女运动及妇女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女政治家在政界推进性别平等目标的愿望和能力，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任何一种平等权利制度的受益者都有可能受到歧视。此类候选人可能被视为一种象征，其代表资格受到质疑。假如候选人没有自己的选区，情况会更糟。由政党领导人决定将哪位妇女列入名单上或是担任预留职位，有望入选的候选人将

方框 9.2 阿根廷就违反配额法律的情况向法律提出挑战

1991年，阿根廷通过一项配额法，要求女性在候选人当中所占比例至少要达到30%。1993年众议院选举期间，各政党和各省的领导人都没有遵守这项法律规定。这是因为当时的选举法官认为配额法不属于“公法”，只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对候选人名单提出质疑。组织严密的妇女团体在官方组织“全国妇女委员会”的支持下迅速行动起来，协助全部24个选区所有政治派别的妇女提起法律诉讼，促使国家选举法院和高等法院做出裁决，认为配额法属于公法，必须强制执行。此外还通过了一项宪法修订案，“通过采取积极措施……让妇女享有进入民选机构和政党机构……的平等机会”。如今，阿根廷国会两院中的女性议员比例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没有达到30%最低法定配额的候选人名单将被驳回。

资料来源：Bouvier，2004。

首先对这位政党领导人负责，而不是对主张性别平等的选区负责。在乌干达，由地方选举团负责保留议席的遴选工作，这种局面阻碍了有志者推动妇女权利议程，或是承认自己同妇女运动之间的关系——如果选举团思想保守，这么做无异于自动弃权。

在各项平等权利措施中，政党自愿采取女性候选人配额制的做法，是实现妇女参政正常化的最有效手段。在有些情况下，制订配额有助于巩固政党对于性别平等的支持，有利于促进女政治家和更广泛的妇女组织之间建立联系。欧洲国家的保守党试图在推举女性候选人的问题上同左翼党派一争高下；假如各个政党能够相互效仿，有关女性代表权的问题必将在“各政党之间蔓延”，⁹从而使性别平等问题能够得到更加广泛的讨论。在采用封闭式名单的情况下，配额制非常有效。但这种制度缺乏民主，往往造成代表脱离选民，使得代表首先要对政党领导人负责，其次才会考虑到选民。在政党权力高度集中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尤其严重，但这往往又是促进妇女参政的最有效途径，因为政党的指示能够冲破人们对于平等权利措施和性别平等的抵制。

由此可见，阻碍妇女参政的各种文化障碍根深蒂固，仅凭平等权利措施显然还难以跨越这些障碍。如果得不到全国妇女运动的支持，平等权利措施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为代议制机构推举一大批在社会背景和政治策略方面同其男性同僚毫无二致的妇女精英。

选民敌意之谜

有效促进女性候选人担任公职的一个顽固障碍是，政党认为女性很难在选举中获胜。但是，选民对于女性候选人的抵触程度似乎还赶不上政

党官僚。2000年1月在巴西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选民认为女性比男候选人更诚实，更可信，更称职，也更能干；由84%的选民表示，他们愿意选举女性担任市长，有80%的选民愿意选举女性担任州长，有72%的选民愿意选举女性担任总统。¹⁰

整个拉丁美洲对于妇女担任公职都持积极态度。2001年，有关方面在这一地区的五座大城市开展民意测验，有57%的调查对象认为，有更多的妇女从政将有利于改善政府；69%的调查对象认为本国在今后20年内将选出一位女总统。¹¹比利时在1988年地方选举之前对法律进行了修订，要求必须把候选人的名字印在选票上，以便于选民了解候选人的性别。令人吃惊的是，女性当选人数增加了26%。¹²

有数据显示，当选印度人民院（下议院）议员的妇女人数少得可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政党不愿意推举女性候选人，而不是由于选民不愿意选举女性代表。1957年以来，女性候选人的当选比例一直高于男性；女性的竞选成功率平均是男性的两倍。¹³然而在其他地区，选民对于女性候选人的态度仍不明朗，甚至反对女性和男性享有同等权力。2001年对津巴布韦选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9%的调查对象赞成男女享有同等的代表权，只有25%的调查对象赞成增加女政治家的人数。¹⁴东欧选民也很不情愿接受妇女担任公共领导职位，同西欧选民相比，东欧选民比较容易认同这样的观点：“男性比女性更加胜任政治领导人的职位。”¹⁵

妇女担任公职及其表现

近十年来，为提高妇女参政水平，对政治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这种变化与妇女运动及妇女

组织的辛勤努力是分不开的，但其中某些变化的发展速度之快，说明公共制度对于社会运动保持着高度敏感。在选举制度和平等权利措施等方面进行的大量尝试表明，制度规划对于妇女能否左右决策机构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为妇女进入公共机关打开方便之门，只是将性别公正纳入国家决策的第一步。妇女担任公职能否有效地支持妇女运动，能否确保新的政策转化为新的服务模式，能否为政府官员的行为制订新的评判标准，还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意识形态及其对性别问题的开放程度；
- 妇女从政后被推选或任命的机构领导职位；
- 有女性议员参加的常务委员会，负责讨论立法和审议政策；
- 政党对于性别公正问题的反应程度；
- 政治家和妇女运动之间的关系；
- 公共机构实施政策或规范私营供应机构、使其维护国家性别公正目标的能力；
- 有效的制度基础，从体制内部促进政府规划的性别公正；注重性别差异的“国家机制”可以包括妇女事务部、机会均等署、以及妇女地位办公室；
- 公共问责制的性别敏感度。

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氛围

妇女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特别是政党对于女权主义思想或反女权主义思想的态度。同右翼政党相比，左翼政党更加支持妇女运动所关注的再分配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从传统上讲，左

翼政党对于妇女问题更加敏感，也更愿意推选女性候选人担任公职。例如，拉丁美洲的中左派政党宣传性别平等思想，支持女性行使公民权。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盟等革命团体特别致力于维护妇女权益。¹⁶

然而纵观历史，左翼政党只有在女性党员发起团结一致的动员行动之后，才会对推选女性候选人和解决性别问题表现出热忱。工党为了从工会方面吸收成员和获取资源，往往在口头上支持性别公正，但一直不愿让妇女担任领导职位；巴西执政党劳工党的这种做法让巴西妇女怨声载道。在提名女性候选人方面，东欧国家的前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派仅仅略优于右翼政党。波兰等国新近涌现出的一些小规模保守党反而推选出了为数众多、成绩卓著的女性候选人。¹⁷

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全球蔓延以及文化和族群特性的政治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左右”之争已经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在工业化国家，政党通常会宣传能够反映出骨干选民利益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颇受工人阶级欢迎的左翼政党强调就业而不是通货膨胀，主张征收资本税，促进具有社会包容性的公共服务；右翼政党则支持公司权利和土地所有权，奉行的政策与左翼政党刚好相反。但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人们保障自己权益的方式不是支持阶级立场，而是利用家庭关系，或是借助民族、地区、宗教、种族网络及特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党可能是围绕某一特定族群或宗教的利益建立起来的，印度某些政党以种姓利益为基础。一向主张包容和非宗教思想的老派左翼政党必须针对这种情况拿出对策。与此同时，这些政党还必须面临一些问题：伴随着苏联集

团的瓦解，国家社会主义受到质疑；自由化和调整对工会组织造成的冲击。

政党和妇女运动之间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左翼政党开始着手同各种社会运动和民众运动结盟，其中就包括妇女运动。假如妇女运动实力强大，并且在民主化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政党便极有可能寻求女性选民的支持。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地区。其他政党同样会不遗余力地向妇女组织拉选票。南亚沙文主义印度教党派、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党派、以及地区种姓或族群政党都表现出明显的趋势。代表下层种姓的北方邦民主党等政党不仅将妇女视为种姓或文化特性的重要传承者，而且认为妇女是重要的选票来源。安得拉邦的泰卢固之乡党等地方政党做出各种亲民姿态，直接取悦于女性选民，例如在选举期间发放燃气罐，迅速扩展妇女自助和小额信贷项目。这些政党的首要工作是施舍，而不是任命更多的女性担任领导职位，或是修改政策，使其更加符合妇女的利益。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批女性选民在2004年进行的邦选举期间突然背弃了泰卢固之乡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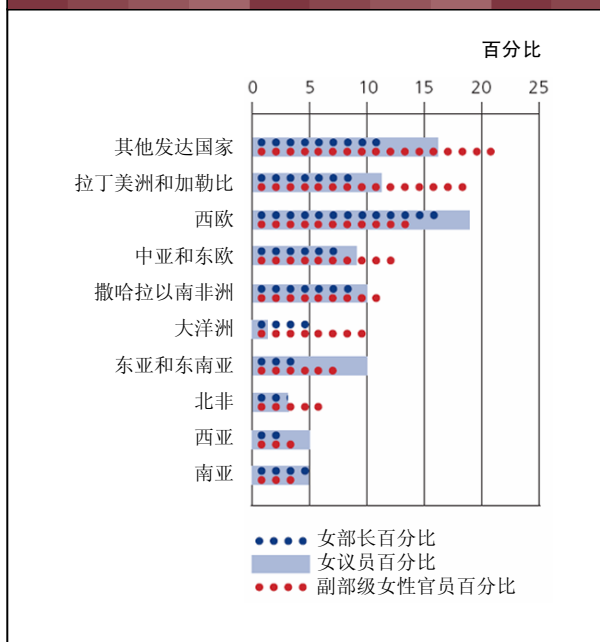
在政党和政府内部主张妇女权利的女性的影响力，取决于她们能否向领导阶层持续施加压力。假如出现更为紧急的情况，政党很可能在最后时刻撤销对于重要立法提案的支持。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中的女权主义者在党内领导层和基层成员中间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政党对于性别平等的承诺绝非理所当然。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女性领导人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沉痛的教训。1998年，非洲人国民大会为进行一项新的军火交易，裁撤了本应分给《家庭暴力议案》的财政拨款。¹⁸

妇女政治角色的不断扩展和变化

担任领导职位的妇女

女议员的人员增加了，但是担任领导职位的女性属于凤毛麟角，限制了她们对于决策过程的参与程度。图9.6表明，担任部级或副部级行政职位的妇女人数同妇女在议会席位中所占比例大致相当。这说明妇女在行政决策者当中属于少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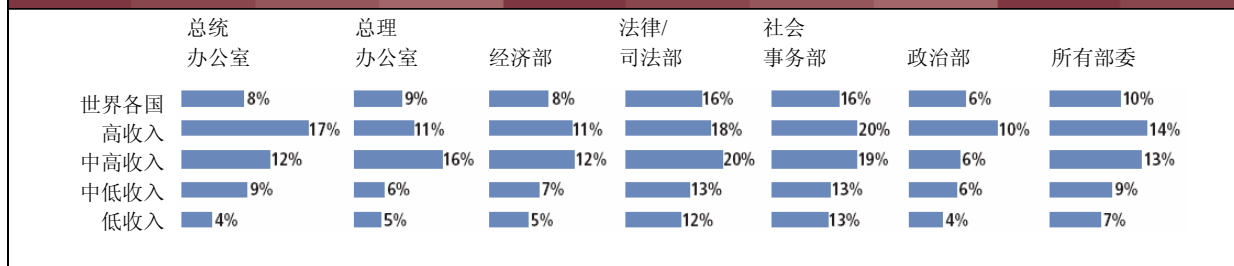
图 9.6 各地区妇女在部级、部级以下以及国民议会中的平均人数，1998 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2004；联合国，2000a。

妇女极少成为国家元首或是政府首脑，她们大多数担任副职，或是参众两院的主席（议长）。妇女出任上议院议长的情况更为普遍，因为上议院所拥有的直接权力少于下议院。此外，女议员担任的部级和副部级职位通常具有明显的性别特色。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财政部、贸易部和工商部等实权部门基本上仍由男性把持，妇女通常出任环境部、社会事务部、卫生部、教育部、

图 9.7 1998 年按收入分列的世界各国妇女分管领域



资料来源：联合国，2000a。

家庭事务部、性别或妇女事务部、以及文化部的部长。担任司法部长和劳动部长的妇女人数比过去有所增加（见图9.7）。

成立核心小组和加入委员会

很多国家的女性议员已经行动起来，在立法讨论中突出性别问题的重要性。有些妇女组建了核心小组，超越政党派别，协调女性议员在立法委员会当中的工作。立法决策过程通常由常务委员会制度居中协调。这些委员会的性别构成情况可以清楚地反映出委员会决策的重要性。妇女力争进入最有实权的委员会：任命委员会、拨款委员会、筹款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以及公共开支委员会。但事实上，女性往往被派往卫生和福利、青年、环境、文化、交通、消费者事务等委员会。据认为，这些部门所管辖的政策领域直接关系到妇女的切身利益。

为打破这种模式，女性议员组建了妇女权利或机遇平等常务委员会。其中最成功的例子是南非议会的“改善妇女生活质量和提高妇女地位联席常设常委会”。设立这个委员会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审议政府对《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执行情况，此后作为常设机构被纳入议会委员会系统，负责评估新立法的性别影响。此外，这个委员会还致力于改革议会机制，对不利于家庭生活的坐班时间

以及缺乏儿童保育设施等问题提出质疑，进一步提高了女议员的工作成效。

提倡妇女权力的议会委员会可能无权审议新的立法，但可以在涉及妇女的政府事务方面发挥政治影响力。然而，妇女权利立法委员会也是有缺点的，女性议员和妇女问题可能会过分集中在这些部门。菲律宾参众两院都设有妇女福利委员会，这就意味着凡影响到妇女的劳动措施均由两院妇女福利委员会进行讨论，而不是提交给劳动委员会。同样，女性议员者大多集中在“她们”的委员会，而没能进入外交或公共开支等更具实权的委员会。¹⁹

在政党内部妇女动员

政党是妇女竞选公职的决策者，同时也是重要的政策论坛，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是促进性别平等的关键机制。妇女运动应该意识到“政党作为促进妇女利益和提高妇女地位的机构载体的生存条件”。²⁰但是，政党在促进妇女利益方面的表现并不积极，如果没有奖励措施或是法定义务，政党不会将性别问题放在首位，也不会推举女性候选人。妇女通常是开展运动和筹集资金的主力，但世界各地的政党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妇女参与决策，尤其是高层领导决策。从少得可怜的现有数据来看，几乎没有一家政党按照基层女性党员的比例来任命妇女担任政党领导和管理职位。

人们通常认为，具备明确的原则和等级制度、透明的选举程序、独立的组织结构和纪律严明的政党最能支持妇女参政。²¹ 但是，假如没有内部民主和承诺，即便是制度完善的政党也有可能不利于妇女参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女性成员比例一直偏低，在毛泽东时代的1973年曾经创纪录地达到10%，其中大多是重要领导人的妻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央委员会的女性成员人数持续下降，在2002年选出的198名中央委员当中，仅有5名妇女当选。²² 东欧前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当中几乎没有女性。

发展中国家政党的组织机构通常比较薄弱，资源、席位和职位的分配取决于恩赐，丝毫不考虑透明度或内部问责制。此类政党的领导制度通常以家族为基础，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不允许内部党员对决策提出质疑。这种制度留给妇女的出路不多，其中之一是利用自己同著名男性政治家之间的亲属关系，获取领导职位。一旦妇女通过这种方式在党内获取职位，她将不太可能同有组织的女权主义运动或是关注妇女问题的其他公民社会组织建立联系，也不太可能支持性别平等事业，对男性政党等级制度提出挑战。在菲律宾，具有性别色彩的家族政治责任几乎已经形成一种制度。一旦男性政治家为遵守限制连任的法规而暂时离任，为维护家族的利益，通常由妻子暂时接替丈夫的职位。²³

妇女政党派别

政党有时会创建“妇女派别”，以便动员女性选民，发展女性党员。但这些派别往往由男性领导的配偶所把持，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并不能成功地培养女性政党领导，也不能促进关注性别公正的政党政策。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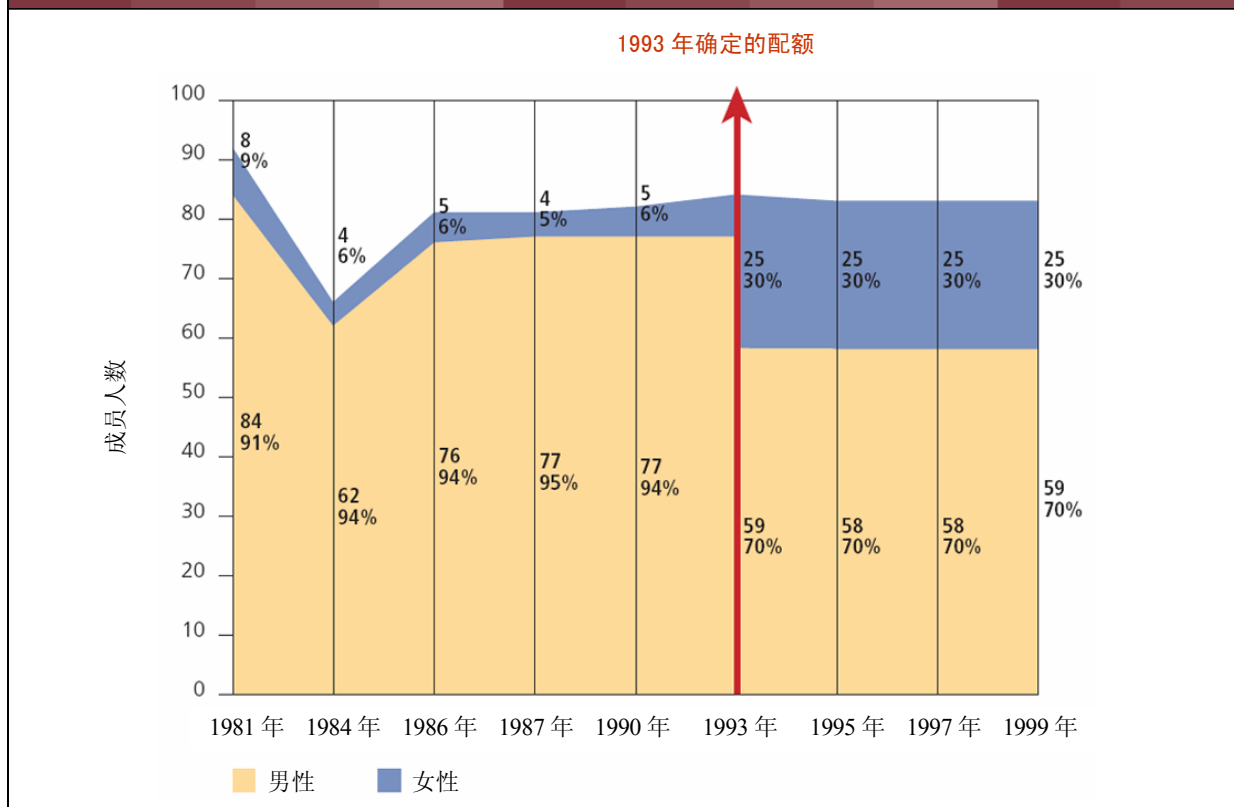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洲人国民大会旗下的妇

女联盟是规模最大、态度最激进的妇女派别，但即使是这样一个联盟也要克服很多困难，才能改变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男性领导人数多于女性的事实以及政党候选人名单中的妇女配额。在妇女联盟之外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妇女活动家和主张妇女权利的公民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之下，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西非和东非国家主要政党的妇女派别致力于控制并抑制广泛的妇女运动，利用妇女的力量来支持总统，其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加纳总统夫人娜娜·科娜杜·阿杰芒·罗林斯发起的12月31日妇女运动。政治人物的配偶垄断用于妇女发展的国际资源以及限制妇女独立协会活动的类似做法，使得妇女在参与国家活动时倍加谨慎。²⁵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地区，由于一党制“大男人”政治日益失信于民，已经影响到了男性政党等级制度的女性支持结构。博茨瓦纳主要政党的基层女性党员揭露了妨碍男性政治家配偶促进妇女权益的利益冲突，推选新的领导，改组妇女党派的组织结构。一个名为“埃芒巴萨迪”的女权主义公民社会组织曾经定期召开会议，邀请政党的妇女派别汇报政党候选人名单配额的实现情况以及安排女性担任政党领导职位的情况。²⁶

为政党领导职位规定妇女配额，是消除阻力、帮助妇女进入政党领导层的方法之一，但实行这种配额比实行政党候选人名单配额要困难得多。在非洲南部地区，只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为其全国执行委员会设立了妇女配额。在各方艰苦努力之下，为妇女在政党候选人名单上争取到了30%的配额；此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终于同意执行领导职位配额。在巴西，有四个政党规定了内部配额，也只有这四个政党的决策部门的女性成员达到10%以上。假如反对妇女参政的阻力非常明显，配额便成为一种限制，而不是通道。巴西劳工党从1993年开始实行配

图 9.8 1981 至 1999 年巴西劳工党全国委员会的男女成员比例



资料来源：Sacchet, 2004。

额制，领导层的女性比例此后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始终保持在30%以下（见图9.8），从中根本看不出劳工党的女性成员比例为40%。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党正在加强内部民主，让党支部成员参与选择候选人和党内决策者。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素以权力高度集中和选举过程缺乏透明度而著称。2001年选举失败之后，革命制度党开始进行由党员直接投票的初选，让基层党员选举出大约一半候选人。此后，墨西哥其他政党纷纷仿效。²⁷ 巴西劳工党在2001年也采取了直接选举候选人的类似做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多黎各政党在提名过程中进行初选，由

基层党员选出的妇女人数要大大多于此前由政党领导人推选的妇女人数，占议会多数席位的两个大党的情况则更是如此。²⁸ 1999年，博茨瓦纳执政党开始进行初选，女性候选人人数飙升，角逐政党提名的妇女人数达到以往历次选举所有政党妇女候选人累积总数的十倍。反对党纷纷效仿，全国各地被提名竞选议会席位的妇女人数也随之大大增加。

创建妇女政党

遭受传统政党男性偏见的妇女有时会成立自己的政党。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二十世纪开始，某些北欧国家的妇女就利用这种方式实现

参政的目的。例如，冰岛妇女在1908年雷克雅未克市政委员会选举中赢得了22%的席位，此后，妇女政党始终致力于推选妇女担任公职。²⁹ 菲律宾的妇女政党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六个妇女政党参加了1998年的议会选举。1994年南非大选期间，有两个妇女政党参与竞选。

亚美尼亚或菲律宾等国修订了选举制度，允许非政府组织推举候选人竞选公职，这将有助于某些社会群体在传统政党无法代表其利益的情况下能够有机会获得选民的支持。在菲律宾，1995年《政党候选人名单制度法案》为非政府组织保留了20%的众议院席位。这些组织不是局限在地方选区，而是在全国选区进行宣传，吸引全国各地的各方利益相关者，从而让全国民众都来关注性别问题。

暴力运动

假如政治运动屡屡受到犯罪或暴力的损害，女性候选人可能会因为不愿卷入暴力或是不愿寻求犯罪网络的暴力支持而退出。在选举期间威胁对手的地方“势力”大多是青年男子，这些人有时是通过政党的“青年派别”组织起来的。温妮·曼德拉领导的南非索韦托“足球俱乐部”就是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有些妇女确实同此类支持团体有瓜葛，但参与这种政治活动的女性明显少于男性。

在津巴布韦，腐败和暴力对于妇女参政造成的影响尤其明显。由于政治镇压和普遍的不安全局势，加入反对派是极其危险的举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参与全国和地方选举的妇女人数锐减。1997年，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通过了一项所有成员国担任公职的妇女比例目标。“津巴布韦女性议员支持协会”致函各政党，提醒他们有

必要提高妇女在各个决策层的参与比例。很少有政党对此给予答复，但是主要反对党——民主变革运动的发言人解释说，由于候选人面临着政治暴力和胁迫，民主变革运动不鼓励妇女站出来：

“人人都了解我们目前所处的政治环境。除非局势发生变化，候选人能够自由竞选，不必担心骚扰和威胁，否则的话，被提名参加地方市政议会选举的女性候选人还会继续减少。”³⁰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筹集竞选经费。人们通常认为，比例代表制和单一议席选区使用的开放式名单将加剧妇女在筹集资金方面的困难。对于个别候选人的关注将诱发个人竞选活动和直接向选民拉票，最终导致政治家寻求庇护——同权贵结盟，以国家资源为交换条件，动员后者的“客户”和趋炎附势者为自己投票。³¹ 此外，候选人还可以通过政党筹集资金。然而，女性候选人普遍认为，政党往往将更多的资金用于资助“比较有把握”的男性候选人开展竞选活动。³² 妇女在民选机构中的比例已经达到“临界点”的大多数国家都为政治竞选活动提供某种形式的政府补贴。

缩小选举性别差异

政党需要吸引女性选民的支持。从理论上说，这应该有利于政党的政策平台更充分地代表妇女利益，提高政党对于女性选民的责任。但是，只有在男女选民的投票行为存在明显“差别”的情况下，政党才会努力吸引妇女的选票。³³ 男女选民的选票流向在以往几十年间都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女性选民会在一定程度上略微偏向保守派候选人。但近些年来，很多西方民主国家出现了选举性别差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妇女开始转而支持自由党或中左翼党派。³⁴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人们直到不久前才刚刚认识到选举性别差异问题。选票上的表

方框 9.3 智利：重要的是选票，而不是信念

1995年，智利政府在艾德华多·弗雷·鲁伊斯-塔格莱总统的领导下推出了一项激进的《智利妇女机会平等计划》。这项计划以其女权主义措辞和包罗万象的目标而出名，比如扩大生殖权利和承认非传统伴侣关系。在一个保守的天主教社会里，这是一项颇具争议的措施。此外，这项计划还标志着政府放宽了对于国家妇女事务局工作目标的控制，并增加了该局的预算。

弗雷总统领导的民主政党联盟突然支持女权主义思想，正是由于在智利选民中间长期以来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1952年之后进行的历届总统选举当中，男女选民的选票流向始终存在差异，1964年为14%，1993年为3%。在1989年总统大选当中，女性选民为大多数，超过选民总数的一半（52%），女性左右选举结果的力量也随之增强。³⁵

由此可见，政府推出《智利妇女机会平等计划》是为了寻求女性选民的支持，而不是迫于妇女团体的压力，也不是针对女性议员提案做出的反应。³⁶智利妇女对于候选人的选择并不比男性更加保守，她们的投票只在一次选举中（1958年）真正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女性选民仍然被视为立场摇摆不定的重要选民群体，她们的选票对于总统大选的结果举足轻重。随着1995年北京妇女会议的临近，政府需要向女性选民展示出女权主义姿态。

资料来源：Baldez, 1997。

格不是按照性别分列的，对于选举性别差异的认识往往取决于女权主义组织是否试图衡量这种差异并进行宣传，以此作为政治筹码。在某些情况下，选票中体现出来的巨大性别差距将对政策走向产生深远的影响（见方框9.3）。

评估妇女的政治效力

女性政治家能够有效地代表妇女利益、推动性别公正吗？女性政治家同男政治家一样，都要处理自己的选民和政党所关注的问题，而对于传统社会团体和保守党派的代言人来说，性别平等问题很可能没有列入议程。政党的选举制度可能将直言不讳的女权主义者视为妨碍竞选获胜的障碍，予以清除，女性政治家不拥护性别公正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女性政治家同活跃的妇女团体之间的联系可能很薄弱，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联系。例如，纳米比亚的女性议员在进入议会之前大多从未参加过妇女组织。³⁷由于家庭式等级制度、身份政治以及由男性把持的选举制度偏见限

制了担任领导职位的妇女人数，在公民社会中享有独立基础的妇女往往被淘汰。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妇女参政比例达到30%的“临界点”，也未必会对政治和决策造成任何影响。

女性议员在政党、阶层、族裔团体或宗教信仰等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她们对于性别平等相关立法的影响力也各不相同。在菲律宾，从1987至2001年间，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妇女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女性占据国会议席的18%；但这种跳跃式增长并没有促使国会提交并通过更多的关注女性问题的立法提案。³⁸女性议员在堕胎权利等敏感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反而阻碍了生殖健康法案的推行。2003年末，反对生殖权利法案的“家庭卫生委员会”女性成员在委员会讨论该法案的过程中大声背诵《玫瑰经》，扰乱了讨论工作。天主教会鼓励反对派行动起来，并公开谴责法案的支持者。在这种情况下，支持这项法案的男女议员人数锐减。

进步不均

一种观点认为，有更多的妇女参政最终必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决策中的性别平等。到目前为止，这种假设在一些工业化国家得到了证实。尽管没有跨国系统化可比数据，但针对在职妇女的立法项目个案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结果。妇女之间的确存在党派利益冲突，但即便如此，女性议员还是会竭尽全力提出并通过相关议案，努力扩大妇女的公民权。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研究至少已有二十几年了。针对立法讨论的参与情况以及政治家提出的议案进行研究清楚地表明，尽管女性和男性所关注的首要政策问题都是一样的（例如加拿大人特别关注经济、社会政策和就业³⁹），但是同男性议员相比，女性议员提出的立法提案更多地涉及到妇女权利、家庭和儿童问题。⁴⁰

在发展中国家，参政妇女人数的增多对于决策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还难以断定。原因之一是，除社会主义国家外，其任职时间足以对决策产生明显影响的妇女人数极少。限制女性议员影响决策的另一项因素是，在一些严重依赖国际金融机构支持的国家，政策革新的范围极其狭窄。自由化对于政府决策选择的限制常常被人夸大，但窘迫的经济形势和对于援助的依赖的确会缩减用于激进的性别政策的资源，解决社会问题往往要让位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投资环境。

要衡量不同地区和不同环境下的妇女对于决策的影响程度，是非常困难的；但我们有必要评估一下妇女担任公职是否真的有助于促进性别公正。随着时间的推移，担任公职的妇女人数同提高妇女地位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明朗起来，比如：产妇死亡率降低，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性别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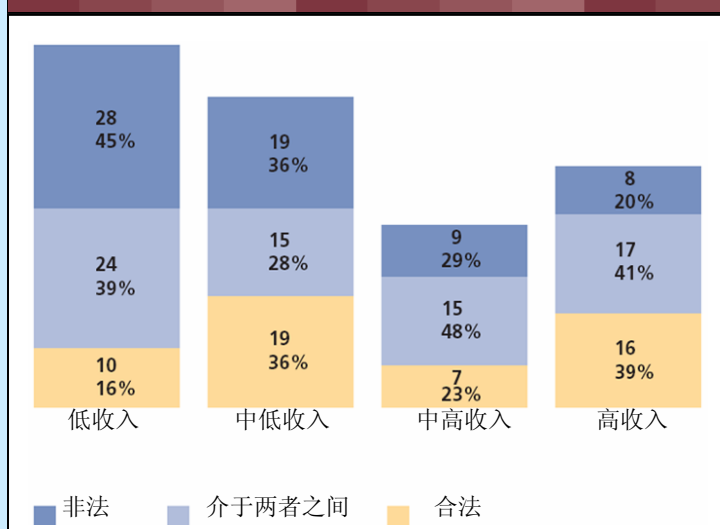
力现象减少，男女之间的资产所有权和财富分配更加均匀。目前还不能肯定妇女担任公职同上述结果之间肯定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在堕胎权利的问题上，担任公职的妇女人数同政策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可以衡量的（见方框9.4）。统计数据显示，女性政治家同堕胎权利之间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一个变量都更为密切，但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堕胎权利有可能是由社会进步政党提出的，这项权利有助于为妇女担任公职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尽管这样，两者之间的关联还是很明显的。

但是在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上，一项研究发现，立法机构中的女性比例同相关政策结果之间只存在着微弱的非线性关系。⁴² 研究结论认为，要确定女性议员对于公共政策的影响方式，仅仅关注立法机构中的妇女人数或是妇女比例，是行不通的。⁴³ 女权主义者或女性议员团体在促进妇女权利方面确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但研究发现，政府针对妇女遭受暴力侵害问题制订相关政策，更多的是由于强大、独立的妇女运动，而不是议会中的女性议员。

方框 9.4 妇女参政的意义何在？对于堕胎法的经验性评估

目前只有28%的国家允许公民依法堕胎（见图9.9）。近15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仍有大约34%的国家将任何情况下的堕胎都视为非法。

图 9.9 2001 年根据各国收入水平分列的堕胎合法性



注：“合法”只包括经批准允许堕胎的国家。“非法”只包括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允许堕胎的国家，妇女有生命危险时除外。但马耳他、智利和萨尔瓦多甚至不允许这种例外。“介于两者之间”包括堕胎既不合法、也不违法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堕胎可以是合法的，特别是在妇女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

资料来源：联合国，2000a。

在什么情况下，一些国家允许堕胎，而在另一些国家却不允许堕胎呢？为回答这一问题，有关研究利用一些重要变量建立了经验性逻辑分析模式，其中包括国家收入水平、妇女的政治及经济参与程度、女性受教育水平、政治体制和国家的宗教。可以根据堕胎法律将各国分为三类：⁴¹

- 经批准的堕胎是合法的（“合法”）
- 某些情况下的堕胎是合法的（“介于两者之间”）
- 任何情况下的堕胎都是非法的（妇女有生命危险时除外，“非法”）

这一模式所得出的分析结果非常明确。在世界各国，妇女的经济和政治参与程度是解释国家何以制订堕胎法的主要变量。若其中一个变量提高1%，堕胎合法化的几率将成比例增加，国家制订法律严禁“非法”堕胎的几率将会减少（减少的比例略低）。

女性识字率、国民收入以及民众是否信仰罗马天主教等其他一些变量也起到一定作用。如果一国被列入低收入国家，堕胎合法化的几率将降低，如果被列入“转型期国家”或“不自由”国家*，相应几率则会增加。假如情况发生转变，从任何情

况下的堕胎均属非法，发展到在有限条件下允许合法堕胎，女性识字率是一个重要因素。假如一国属于罗马天主教国家、低收入国家或中低收入国家，从任何情况下均不允许堕胎到允许有效堕胎权利的变化几率将会减少。

在进行分析时需要非常谨慎。上述经验性分析没有证实任何因果关系，只是反映出在影响堕胎法的严厉程度或灵活性的各种变量之间存在统计关联。

注：（*）自由之家组织所使用的分类标准（www.freedomhouse.org）。根据衡量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调查结果，国家被分为“自由”和“不自由”两类。“转型期国家”指前共产党国家。

资料来源：Cueva，2004。

注释

- 1 Molyneux, 1994; Jie, 2004。
- 2 Kenworthy and Malami, 1999:254-5。
- 3 Dahlerup, 1986; Beckwith, 2002。
- 4 WEDO, 2001。
- 5 Meintjes, 2003。
- 6 Jayaweera, 1997:421。
- 7 Narayan et al., 1999:2。
- 8 Matland, 1999; Reynolds, 1999; Yoon, 2001。
- 9 Matland and Studlar, 1996。
- 10 CFEMEA, 2000:2。
- 11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01。
- 12 Darcy et al., 1994:150。
- 13 Narayan et al., 1999。
- 14 Women in Parliament Support Unit, 2001:4。
- 15 Wilcox et al., 2003, cited in Fodor, 2004a:15。
- 16 Luciak, 2001。
- 17 Fodor, 2004a:21。
- 18 Selolwane, 2004:72。
- 19 Sobritchea, 2004:5。
- 20 Beckwith, 2000:439。
- 21 Norris and Lovenduski, 1993; Walyen, 2000。
- 22 Jie, 2004。
- 23 Sobritchea, 2004:7。
- 24 Tsikata, 2001。
- 25 Sow, 2004; Tripp, 2000; Tamale, 1999。
- 26 Selolwane, 1997, 1999。
- 27 Baldez, 2004。
- 28 del Alba Acevedo, 2000:19。
- 29 Bjarnhé_insdottir, 1905。
- 30 Sunshine for Women, 2004。
- 31 Nicolau and Schmitt, 1995:144。
- 32 Sacchet, 2004:13; Goetz, 2003:134。
- 33 Mueller, 1988:31。
- 34 Hayes and McAllister, 1997:6。
- 35 Hayes and McAllister, 1997:1。
- 36 Baldez, 1997。
- 37 Bauer, 2004:17。
- 38 Sobritchea, 2004:7, 转引自Naz, 2002:27。
- 39 Tremblay, 1998:450。
- 40 Thomas, 1991; Dodson and Carroll, 1991; Kathlene, 1994; McAllister and Studlar, 1992; Vega and Firestone, 1995; Norris, 1996。
- 41 堕胎法通常可以分为七种类型：（1）根据请求，允许合法堕胎；（2）出于某种社会和经济原因，允许合法堕胎；（3）因胎儿出现畸形，允许堕胎；（4）在强奸或乱伦的情况下允许堕胎；（5）为保护妇女的心理健康，允许堕胎；（6）为保护妇女的身体健康，允许堕胎；以及（7）堕胎属于非法（大多数国家规定，在妇女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例外）。
- 42 Weldon, 2002:chapter 4。
- 43 Weldon, 2002:14。